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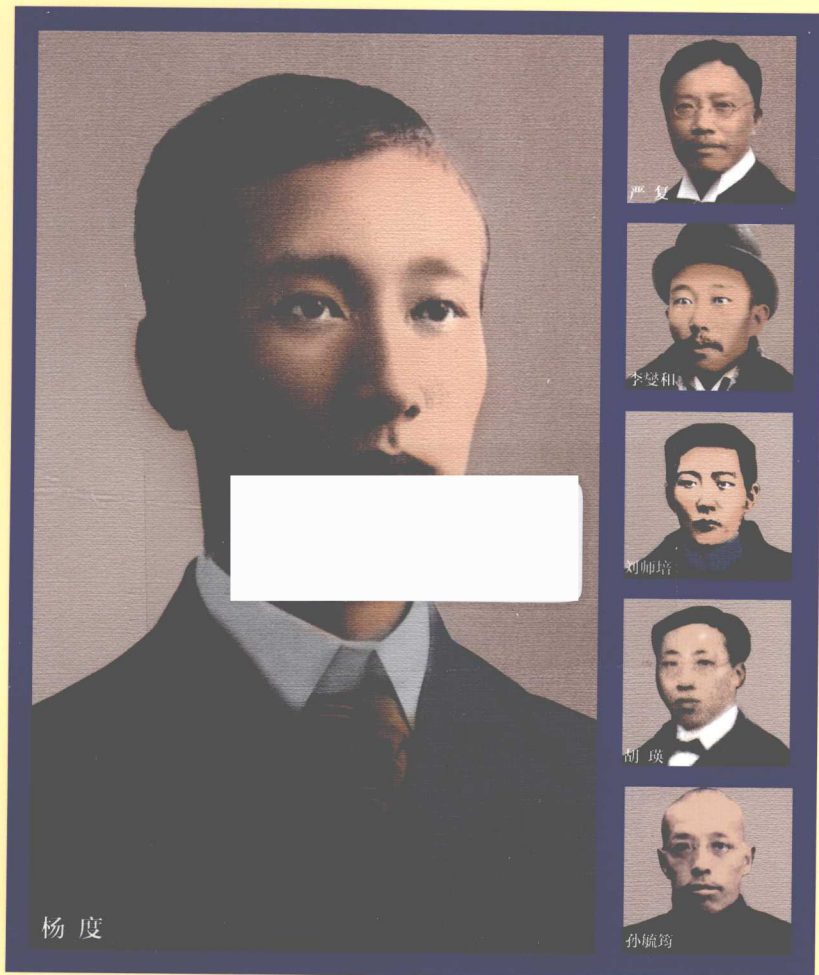
民国
第一
现场

北洋文流

六君子传

陶菊隐◎著

君子？贼子？一部民国开国史、
军阀斗争史、再造共和史



杨度

严复

李季忠

刘师培

顾瑛

孙毓筠

北洋文流

六君子传

陶菊隐◎著

 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• 北 京 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洋文流：六君子传 / 陶菊隐著. — 北京：群言出版社，2015.8

ISBN 978-7-80256-770-2

I. ①北… II. ①陶… III. ①历史人物—列传—中国—民国 IV. ①K82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07733号

责任编辑：盛利君

装帧设计：王 鑫

出版发行：群言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(100006)

网 址：www.qypublish.com

自营网店：<http://qycbs.shop.kongfz.com> (孔夫子旧书网)
<http://www.qypublish.com> (官方网店)

电子信箱：qunyancbs@126.com

总 编 室：010-65265404 65267783

编 辑 部：010-65138815 65262436 65276609

发 行 部：010-65263345 65263836

市 场 部：010-65220236 65265832 (读者服务)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

印 刷：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17

字 数：190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80256-770-2

定 价：39.80元



【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】

自序

这部书写在《吴佩孚将军传》之后，是民国三十年^[1]双十节脱稿的。我为什么要写这两部谈掌故的书呢，说起来有一段苦痛的回忆：当我还是涂鸦少年的时候，喜在报纸上发表作品，从小说写起，一直写到评论，觉得所要说的话很多，而所受的限制很严，所能发表的范围很窄。那时上海有租界，是军阀势力所不及，言论较自由的地方；后来我改变方针，替上海报写通信稿，我所要说的话，在地方报不能发表的，在上海报能尽量地登载出来，那时我像发现新大陆一般愉快。

我在故乡长沙，用尽可能的方法逃避当地的邮件检查（或托人带信来沪，或利用日本邮便局，或用军事机关信封而以报馆私人为收件人，或用英文而以洋商名义发信），平均每日发一函，每函长约二千字。倘有一天不写，心里头就难过得像放弃了一天的责任一样。如此经过七八年之久，上海也不复为新闻自由的理想天地了，我移转方向，改以天津报为目标。

二十五年搬到上海来，我感到言论不自由真是新闻记者精神上的枷锁，这枷锁一日不解除，则一切自由均无从谈起。我不能摆脱新闻记者不做，又不肯强作违心之论，以投时贤之所好；在穷则变变则通之原则下，乃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；不谈本国政治，专写国际问题。我以为这该可以尽情发挥了，但是天下事真难说，你谈某些问题，有人会怀疑你影射本国的某某问题，同时“闲话皇帝”一类的文章，能引起外国压力而使执笔者获罪入狱。

[1] 民国三十年：即1941年，民国元年为1911年，民国几年加上1911就是相应的公元年份。

因路路不通的缘故，才使我决心由一个新闻记者变成了旧闻记者，改写事隔多年的国故丛谈。这两部书就是在那种环境和那种心情之下的产物。

这部书和《吴传》一样，逐日在当时的新闻报发表。但《吴传》登完一段写一段，这部书却是穷两月之力，一口气写成的，其大部分时间用之于搜集参考材料与接洽有关人物的上头。我一面登报，一面交中华书局付印，报上未登完，样本已排好，剩下来的只有付印和装订的手续。

天下难说的事太多，你以为印好了就可以发行吗？是年十二月八日，黑暗势力突然地侵入了当时的上海租界，从此未登完的余稿不再见之于报纸，而出书亦因之延搁至今。不但这样，连我已出版的《菊隐丛谈》二十种，也被日本人列入“禁书”，或毁版，或禁售。我应当感谢他们，在漫漫长夜中，我有充分时间补充了许多材料，使这部书的内容较充实，比原稿增加了三分之一。

《吴传》是民七至民十五北方军阀的政治斗争史，那么说得狂妄点，这部书算是民元至民六的开国史和再造共和史吧！其中包含着辛亥革命前的排满潮和党团活动，袁世凯与清廷之斗法，南北议和与统一，二次独立因宋案发生，还穿插有纵横五六省的狼祸纪实，和因帝制引起的五九国耻，最后以洪宪丑剧及袁世凯忧愤而死为结局。这是民国成立前后的一大动荡时期，一方有着可泣可歌的史料，一方腐恶势力之顽强，政治道德之破产，是开国时期所不能避免的现象。

我生平写稿，粗制滥造或所难免，但我敢于自信的，不肯说一句假话，不愿写一件假事。我这个记者，为新为旧是另一问题，我所注意的是真假问题，要努力做一个真记者，尽量地保存事实的真相。这两部书虽不敢自诩为与当年的事实毫无出入，至少对于说真话和写真事两点，已作了相当的努力。

还有一部《督军团传》，不久或可问世，和这两部书联系起来，是民元至民十五间民国初期的掌故。

民国三十五年二月二日，旧闻记者。

目 录

自序

从六君子说到六君子 / 001

东京鸟瞰 / 006

清廷的假膏药 / 011

宁汉党狱 / 016

黄鹤楼头革命潮 / 020

八月十九日 / 024

三条辩子 / 029

袁的“两面光” / 035

淮海之间 / 040

对袁的“绥靖政策” / 045

再接再厉 / 049

人间何处有“林清” / 053

统一与混乱 / 059

政党内阁制 / 068

毁宋酬勋 / 077

二次独立 / 083

陈其美之言 / 089

袁江南 / 098

名流内阁 / 104

春云渐展 / 111

故宫博物院 / 119

狼来了 / 126

神话头脑 / 133

两个不识时务者 / 137

五月九日 / 143

南北两将军 / 148

西蜀将军 / 155

泱泱乎君子之风 / 160

帝制思想源流考 / 168

刘申叔与黄季刚 / 172

严几道与林琴南 / 176

帝子苍茫丑剧多 / 182

屈膝将军何多 / 187

八十三天的梦 / 193

松坡将军逢场作戏 / 200

所争者人格耳 / 205

二陈汤 / 216

江南春色 / 224

画虎不成 / 233

西山日落 / 238

归隐洹上村 / 244

东海星沉 / 251

到光明之路 / 256

北京党狱 / 260

从六君子说到六君子

“六君子”原是好听的名称。历史上所称为“六君子”的，唐玄宗时有陈宜中等（第一批），宋宁宗时有太学生周端朝等（第二批），明熹宗时杨涟、左光斗等为魏忠贤所害（第三批），周起元、缪昌期、周顺昌等死于狱中（第四批），这些人都是具有热血的中华魂，国家和民族间之正气，以泪和血写成他们可宝贵的史篇。最后一批“六君子”便是光绪朝维新之变，谭嗣同、林旭、杨锐、刘光第、杨深秀、康广仁等（第五批）死于西太后之手，他们虽则因时代关系，囿于“忠君报主”的旧观念，对民族问题不曾理解到，但那次惊人事件后，国人始晓然于清室之不足与有为，一时崛起的志士仁人，由维新狂热转变到革命激流，则他们在菜市口的血也不是白流的。

民国既成立，打倒了专制淫威的帝后，则“六君子”之名当不再见于经传了；不料民国四年间，又有变形易质的“六君子”出现，杨度、孙毓筠、胡瑛、李燮和、刘师培、严复等组织所谓“筹安会”，时人戏呼之为“六君子”，这是“六君子”的反角，也是近代历史上的一幕怪剧。

我们如稍回忆，清末和民国初期两次“六君子”事件，袁世凯都是其中极重要的角色：他出卖戊戌六君子以成其功名富贵，而起用洪宪“六君子”却未尝不是他自促败亡的动机。事之凑巧的，袁与湖南人像特别有缘，戊戌六君子以谭嗣同为核心，是一位湖南人（浏阳），洪宪六君子的主角是杨度，

又是一位湖南人（湘潭）。后来打倒洪宪帝的蔡锷也是湖南人（宝庆）。

袁之不臣于清室，不始于辛亥逼宫，而始于戊戌之告密。他若不把戊戌六君子的血染红了他自己的顶子，也许光绪帝能够排除万难，恢复其君主特权，挂起了“君宪”招牌，推行其以康梁为中心的新政，虽则最后仍无裨于清室之覆亡，却未尝不足以蒙混一时，动摇了民族观念，也许辛亥年熊秉坤等攘臂一呼，不能一举而断送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天下。

下述史实，是袁出卖戊戌六君子的一段过程。

戊戌年（光绪二十四年）^{〔1〕}四月下诏维新后，七月擢谭嗣同、刘光第、杨锐、林旭为四品京卿，他们都算是天子的近臣，和现在的机要秘书一样，而当时翎顶辉煌的军机大臣反变成了吃饭不做事的庙堂傀儡了。试想，畏新政如虎，视康梁若蛇蝎的西太后，能够容忍得下吗？她正在计划着以九月天津观操为由，命直隶总督荣禄实行所谓废立之计。谭嗣同听得这消息不觉慌了手脚，想利用平日向新党暗送秋波的袁，以推翻西太后的毒谋。

袁刚授直隶按察使不久，尚未到差。八月初二召见，即开去本缺，升为候补侍郎，办理练兵事务。这次破格升迁，是谭怂恿着光绪帝以“殊恩”感动他，想用他的新军对抗那手握重兵的荣禄，进而推翻那阻害新政的太后。

初三晚，袁邸中来了不速之客，就是那位炙手可热的谭京卿。他向袁道贺后，即转入本题说：“你懂得恩诏的来由吗？”

袁是老奸巨猾，虽然胸中雪亮，却故意地推开来说：“不晓得哪位大臣口角春风，倒使我受宠若惊。”

谭连连地摇着头，表示不以为然的样子。

袁低声说道：“是老兄的错爱？”

谭仍然摇着头微笑着。

袁说：“愿闻明教，以开茅塞。”

谭用极端严肃的口吻，吐着“简在帝心”四个字，每个字都说得沉重而有力。

〔1〕 戊戌年（光绪二十四年）：1898年。

而袁呢，亦用极端严肃的态度，表示其“感激涕零”。一个算是“饥不择食”，一个却“满脸都是戏”。

谈话渐渐入港，两人的声带亦渐渐低沉下来。谭把满腔的心事都说出：“皇上的大难中，不久有密旨，命你将荣禄正法，带兵入卫，把守颐和园，即命你升任直隶总督。”

袁幕中有一位智囊——尹铭绶，是谭文勤公（名钟麟，党国要人谭延闿之父）的孙女婿（长子朴吾的女婿），以榜眼授翰林院编修，这里又是一位湖南人（茶陵）。袁送过了客，就把尹找过来唧唧嚷嚷地讨论了很久，以后便发生太后再临朝和诛戮六君子等等惊人动作。

后来袁摇身一变，变做了民国总统，曾在报端发表戊戌政变日记，是替他本身和荣禄洗刷的。兹节录于下：

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廿九日，予奉召由天津抵京，定八月朔请安。初一日黎明在毓兰堂召见，上垂询军事甚详，退下。忽有苏拉^[1]来报，已以侍郎候补，并有军机处交片：“奉旨，令初五日请训。”次早，谢恩，召见，陈无尺寸之功，受破格之赏，惭悚万状。上笑谕：“人人都说你练的兵，办的学堂甚好，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。”

初三晚，谭嗣同突如夜访，谓有密语，请入内室，屏去仆丁，心甚讶之。……谭云：“公受此破格殊恩，必将有以图报。上方有大难，非公莫能救。……荣某将废立弑君，公知之否？”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：“荣某谋废立弑君，大逆不道，若不速除，上位不能保，即帝命亦不能保。袁世凯初五请训，请面付朱谕一道，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，出朱谕宣读，立即正法，即以袁某代为总督，布告荣某罪状，即封禁电局铁路，迅载袁某部兵入京，派一半围颐和园，一半守宫。如不听臣策，即死在上前。”各等语。予闻之魂飞天外。

谭云：“今要公以二事，诛荣某，围颐和园耳，如不许我，即死在公前。公之性命在我手，我之性命亦在公手。必须今晚定议，我即请旨办理。”予

[1] 苏拉：清代内廷机构中担任勤务的人。

谓：“此事重大，今晚即杀我，亦决不能定。且你今夜请旨，上亦未必允准。”谭云：“初五日定有朱谕一道面交公。”予见其气焰凶狠，只好设词推宕，……因答以“青天在上，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，但恐累及皇上，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。我无此胆量，决不敢造次，为天下罪人。”谭再三催促定议，几至声色俱厉。腰间似有凶器，予知其必不空回，因告以“九月即将巡幸天津，伊时军队咸集，皇上下一寸纸条，谁敢不遵，何事不成？”谭云：“报君恩，救君难，立奇功大业，天下事尽入公掌握，在于公；若贪图富贵，告变封侯，害及天子，亦在公，唯公自裁。”

初五日请训，因奏曰：“古今各国变法非易，请忍对待时，如操之太急，必生流弊，必须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主持，方可仰答圣意。至新进诸臣，阅历太浅，办事不能慎密，倘有疏虞，累及皇上，关系极重。臣受恩深重，不敢不冒死直陈。”上为动容，无答谕，请安，退下，即赴车站。抵津日已落，即谒荣相，略述内情。

越四日，荣相奉召入都，临行相约，誓以死保全皇上。……良以慈圣祖母也，皇上父亲也，处祖母父亲之间，为子孙者唯有出死力以调和；至伦常之变，非子孙所忍言，亦非子孙所敢问。

他面谏光绪的一段话是没有根据的，最有根据的是他后来一帆风顺的官运：光绪二十五年（己亥）十一月授山东巡抚，庚子（二十六年）之乱，与粤督李鸿章、江督刘坤一、湖督张之洞等合议划境自保，因之义和团不敢入山东境一步，因之得“才堪应变”之名；二十七年（辛丑）继李鸿章署直隶总督；十二月参与政务处；二十八年（壬寅）实授直督，还兼着商务、路政、电报、外交、练兵等等大臣的头衔。后来李、张两人相继谢世，他竟变成了唯一的“庙堂柱石”。三十四年两宫升遐^[1]，才使他真正遇着一次“魂飞天外”的打击。

光绪死得突兀，当时就有中毒的传说，迄今尚为疑案。又有遗诏诛袁的

[1] 升遐：帝王死去的婉辞。

种种传说。不论怎样，摄政王载沣是光绪的亲兄弟，想替哥哥报仇，是情理上所应有的。加以满汉人兵权之争——满人铁良、良弼等一口咬定汉人非其族类，尤以袁练兵为其心腹之患——所以光绪死后不到一个月，清廷就叫袁“回籍养病”。（袁早知为清室亲贵所不容，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奏请解除兼职，将北洋第三、第五、第六各镇交部直辖，清廷允之，以旗人凤山为一、三、五、六四镇总统。）

载沣不诛袁而仅仅叫他“养病”，是不敢下手，不是不忍下手。北洋新军都是袁的耳目或心腹，以柔懦的摄政王，敢于悍然为之而不顾其后果吗？所以袁虽则奉令下野，暗中仍是北洋军的首领，仍是清廷的心腹之患。那时他已不重视那位尹榜眼了，却找到另外一个湖南人，另外一个智囊，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杨度。杨随他到彰德，为之策划奔走。他的长子克定在北京做邮传部丞参，是他的留京内线。北洋总督杨士骧、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和若干督抚们是他所散布的私党和资金网。要钱有钱，要人马有人马，只等时机一到，不愁没有“东山再起”的机会。

尹榜眼何以被袁遗弃了呢？当袁外放鲁抚时，曾经保举他做过山东学台，以酬其功。当义和团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，他又来献策，主张怀柔拳民，以免失太后之意。但是袁一则鉴于外国人的势力比太后大，二则与两江、两湖、两广诸总督有“保境安民”的新结合，所以不肯采纳他的建议。并且袁是个极端猜忌的人，不愿别人多预闻他的机密，又觉得“尹才子江淹才尽”，所以渐渐地冷落了他。尹又因礼部勘卷事，与其座师——礼部尚书徐桐大闹，竟至专折参徐，当时师弟之分极严，学生打倒老师是清议所不容的，所以尹后来外放江南候补道，在南京潦倒以终。

东京鸟瞰

第一次新政被推翻，引起了义和团之变，引起了八国联军入京的奇耻大辱，同时却又引起了光芒万丈的革命火把，清廷于创巨痛深之余，才有所谓“筹备立宪”之举，想用“假膏药”来转移各方的视线。辛丑年复开经济特科，癸卯年（光绪廿九年）闰五月光绪在保和殿举行“御试”，应考的有两个后来在民国史上掀风作浪的怪人物，一个是广东人梁士诒，一个是湖南人杨度。梁中了一等第一名，杨是一等第二名。榜发后，西太后向军机大臣瞿鸿禨（湖南善化人）偶然谈到特科人才，瞿奏称：“初试一等一名梁士诒是广东人，梁启超的兄弟，孙文的同县人，名字又和康祖诒（有为原名）的末一字相同。梁头康足，其人可知。”这位颠倒错乱的大臣，把三水人（士诒）硬派作新会人（启超）的兄弟，把香山（中山）与三水当作一县。但是西后一听得革命领袖和康梁的大名，即马上变色，连初试的阅卷大臣都被她撤换了。同一时期，杨度亦有“康梁余党”的嫌疑，吓得他和梁都不敢入场复试。

杨是王湘绮（名闳运，字壬秋，湖南湘潭人）的得意门人。少年丧父，和他的妹妹杨庄（字少姬）有才男才女之称。少姬就是湘绮最小的儿媳（湘绮第四子名文育，字季果，乃少姬之夫。）民国初期，一个白发垂髫的老人带着一个年老貌丑的女人，形影相随，招摇过市，千手所指，万目所视，都笑这个老名士和上坑老妈子的活剧，而此老泰然自若，因之时人都说湘绮玩

世不恭，却不知他是苏张一流人物：他在曾国藩幕府时，暗中屡次进言：“你出死力替别人争天下，何不留以自取！”吓得曾不敢答话。有一次，他口称机密大事，请曾屏退侍从，又在私室中反复陈说清廷之不足以有为，与其碌碌依人，何如创业垂统？曾侧着头把眼光射在地下，一面用指头蘸着茶水在案上信手作字，后来仆人发现他所写的都是“妄”字。曾引进乡贤很多，终其身不敢保举湘绮，而湘绮亦视之为“一个无出息的伟人”。

杨在湘绮门墙中养成了通脱不羁的个性，涂脂傅粉，涉猎花丛，与龙阳才子易实甫一模一样。一次，少姬夫妇口角，杨写信给乃妹说：“夫妇之道同于君臣，合则留，不合则去。”少姬涕泣求去，急得湘绮搔首顿足说：“你不看他（指其子）的面，须看我的老面。你不做我的媳妇，做我的女弟子何如！”

民国四年，国史馆协修宋育仁因主张复辟被捕，解回四川原籍。宋是湘绮弟子之一，且湘绮正任国史馆长，他留了一封信给“慰亭老侄总统”，把印授交给杨（时杨任该馆副馆长），悄然不辞而去。他死后杨的挽词是：“旷代圣人才，能以逍遥通世法。平生帝王举，只今颠沛愧师承。”

杨的伯父瑞生曾任朝阳镇总兵。他有一名马弁^[1]是后来北洋三杰之一——大名鼎鼎的王士珍。那时聂士成练武卫新军，向瑞生要人才，瑞生开了一张名单，守备王士珍也在其内。不料王守备自请退休，就把王马弁顶名荐了过去。后又选送袁世凯所办的武备学堂，毕业后提拔到统制的地位，民国成立后又屡任总长、总理，而那个真正王士珍却穷得只剩下一条寡裤带，在湘潭杨家烧饭挑水。有人指点他：“你何不找找你的替身，你的替身不是既富且贵了吗？”王顾左右而言他。

明白杨的身世及其少年时所师承的人物，已不难揣想他后来将演变为怎样一个角儿了。有人把他归纳于保皇党，那是不正确的，实实在在，他欲以悬河之口及纵横之术物色一个有魄力、有地位、有帝王思想的主子，地位要

[1] 马弁：指官员身边带的随从。

与曾国藩相若，胆量要比曾大，然后帮助他取天下而自为开国元勋，以竟湘绮未竟之志。严格分析起来，他是君主立宪派，与民主立宪派（革命党）格格不入，但又不愿翊戴清廷，所以又不能与康梁所领导的君宪派合流共趋。

因瞿鸿禨的一番瞎话，害得他背了“康梁余党”的招牌，茫然东渡，不久即与其乡人范源濂（湖南湘阴人）分任东京留学生会正副会长（杨正范副）。听说他离开北京时，张之洞颇赏识他，叫他递门生帖子，许以将来有机会时慢慢提拔他。也许他那时看中了张，认作他的“曾国藩”，他在东京做了张的第五纵队，常把东京留学界空气报告那位“识时务而不彻底，欲改革而无勇气”的清廷元老。

湖南人满天下，东京中国人社团中到处都听得楚歌声，所以杨的活动力很大。他本来很有钱，又有人接济，他的饭田町寓所俄然变成了“留日学生俱乐部”和“湖南会馆”，常以大坛酒、大块肉招待同国人和同乡人，和他往来的有各党各派，绝无畛域之见。当中往来最密的有黄蘆午、陈天华、宋教仁、刘揆一、杨笃生等，这几位都是湖南的极端革命派。（陈天华是革命党的大文豪，湖南新化人，于乙巳年十一月十二日^[1]在日本投海。所著有《警世钟》《猛回头》等篇是革命时的重要文献，感人极深，辛亥革命颇受其影响。杨笃生是湖南长沙人，吴樾刺五大臣的炸弹便是他所手制的，后来在伦敦蹈海死。）

乙巳年（光绪三十一年）七月，中山先生由欧洲到日本，对革命事业再作大规模的策动。中山先生始意想合并革命保皇两党，良以两党皆为汉族，主持之者皆为粤人，参加者又皆国中英俊之士，与其分道扬镳，何如通力合作！不料康长素眼高于顶，且富有“忠君报主”之忱，梁任公虽有入彀之意（康党有“卓如已入行者圈套”之语），亦不敢过于“离经叛道”，所以中山先生的合并计划不成，却于无意中实现了“另一合并计划”，正应了“有意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”的两句老话。

[1] 乙巳年十一月十二日：1905年12月8日。

杨虽非革命党人，却不是古板死气的保皇党，论才智高人一等，论声势亦复不弱。中山先生想把这个“中间派”拉过来做同志，乃与程家桢等访杨于其寓所，不惜反复开导，说了许多“排满必胜、建国必成”的话，无如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，这由于杨生平不作第二人想，不愿坐保皇党的第三把交椅，同样不愿在中山先生领导下做亦步亦趋的信徒，而欲于革命保皇两党对峙中造成第三者的优势，以达其“开国元勋”之目的。

中山先生的理论是：与满人谈改革，无异与虎谋皮。而杨则答以“革命的破坏性太大，中国已疲弱，不堪服猛剂以召危亡之祸。英日皆以君主立宪而强，满族虽不足有为，倘待有为者出而问世，则事半功倍必倍。……”

顽石既不点头，生公亦无由说法。不料杨把话锋一转说：“我们意见不同，各走各的路线，倘能打通任何一条路线，都是于国家有利的。我们虽不能合作，敝同乡黄麐午等人的主张却与公相合，我介绍给公何如？”

麐午就是黄克强先生（兴）当时的名字。孙黄两大革命领袖之结合乃由于杨的介见，真是天下事之不可解者。中山先生的兴中会有理论，有实行；黄的华兴会则偏重实行而鲜有启迪群众的理论，因之外间谥黄为“革命实行家”，在东京颇有如火如荼的声势。孙黄一见面，就感于志同道合，乃将两会归并为同盟会，推中山先生为最高领袖，而革命之基础益固。

一般人都记得同盟会以《民报》为喉舌，保皇党以《新民丛报》为宣传机关，双方常常展开笔战，却罕有注意到以第三者自居的杨亦有一种刊物叫作《中国新报》的。杨在报端发表“新湖南”及“金铁主义”，与另两党若即若离，实为满清末期的投机派。

革命保皇两党的政战可分为两大时期：自乙未至庚子^[1]五年间为保皇党一手遮天的时期，康的一张嘴会吹，像抱着孤臣孽子之心，把光绪吹得是一代“圣明之主”；梁的一支笔会写，写得使人们看了心旌摇晃不定。加以国人的心理是很难有急角度的转变的，以变法图强为终南捷径，以民

[1] 乙未至庚子：1895年—1900年。